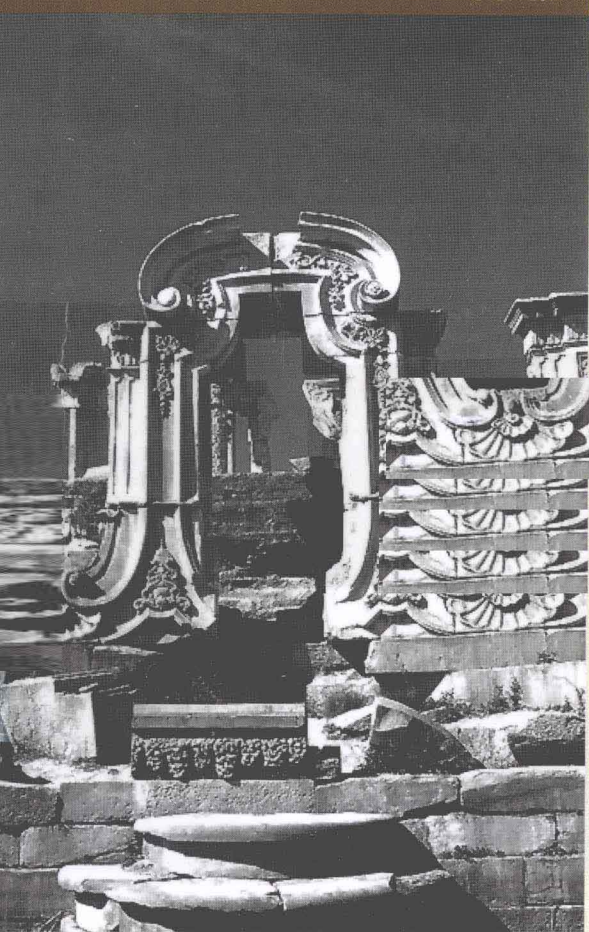


地平线
策·划·工·作·室
DIPINGXIAN CENHUA GONGZUOSHI

通·识·书·系

ZHONGXIWENHUA BIJIAO GAILUN



中西文化比较概论

Zhongxiwenhua Bijiao Gailun

叶胜年 〇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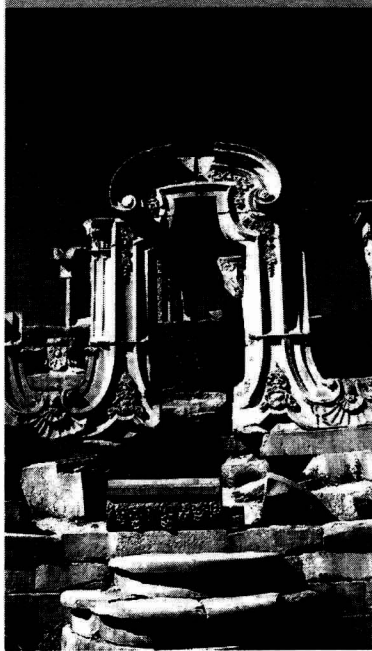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PRESS

地平线
策·划·工·作·室
DIPINGXIAN CENHUA GONGZUOSHI
通·识·书·系

中西文化比较概论

ZHONGXI WENHUA BIJIAO GAILUN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西文化比较概论/叶胜年著. —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1.3

(地平线策划工作室通识书系)

ISBN 978 - 7 - 5638 - 1901 - 0

I. ①中… II. ①叶… III. ①比较文化—中国、西方国家
IV. G0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19505号

中西文化比较概论

叶胜年 著

出版发行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红庙(邮编100026)

电 话 (010)65976483 65065761 65071505(传真)

网 址 <http://www.sjmcb.com>

E-mail publish@cueb.edu.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服务部

印 刷 北京大华山印刷厂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 数 227千字

印 张 8.875

版 次 2011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 1~4000

书 号 ISBN 978 - 7 - 5638 - 1901 - 0/G · 297

定 价 22.00元

图书印装若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引论	1
一、文化比较的动机和研究范围	1
二、本书的要点	2
三、正在赶上的差距	17
第二章 中西古代哲学思想的比较	18
一、中国古代哲学概述	19
二、古代西方哲学概述	30
三、中西比较论述	40
第三章 中西中古哲学思想的比较	52
一、中国中古时期的哲学思想发展及其代表人物	54
二、中世纪西方哲学思想的发展	63
三、中西比较论述	70
第四章 中西现代哲学思想的比较	86
一、现代哲学思想的社会和心智发展环境	87
二、中国现代哲学思想的发展及其代表人物	90
三、西方现代哲学思想的主要流派及其代表人物	99
四、中西比较论述	110
第五章 中英语言的比较	120
一、中英两种语言的诞生与发展	121
二、汉语的主要特征	125
三、英语的主要特点	130
四、中英语言比较论述	135



第六章 中西诗歌的比较	149
一、中西诗歌的发展概况	150
二、中西诗歌里的主要含蕴	154
三、两种诗歌的审美意识	161
四、诗歌形式	180
第七章 中西小说的比较	187
一、中西小说的历史发展进程	188
二、有关小说意识的理解和异同	192
三、小说的题材和蕴涵	197
四、中西小说的写作手法	206
第八章 中西绘画的比较	218
一、中国绘画的发展和特征	219
二、西方绘画的发展和特征	229
三、中西绘画比较论述	240
第九章 中西科技的比较	251
一、中国科技发展概况	252
二、西方科技发展概况	259
三、中西科技比较论述	268
后记	280



第一章

引 论

当今世界,全球化趋势如火如荼,方兴未艾,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社会发展模式。人类生活在一个地球村,在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必须要互相沟通,互相交往,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乃至互相依存。在这一趋势下,我们对于外国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或者西方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深入理解已成为眼下不时之需。西方人的思想、文化和科技信息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当中,对我们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或者产生着各种各样的影响。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不断地接触、学习和使用同西方文化有关的林林总总的知识,并从中获益,也因此推动了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进程。

一、文化比较的动机和研究范围

在当今世界,文化的学习和影响从来就不是单方面的行为,而是双方的互动过程。如何认识和处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已经成为我们今天不得不面对和思考的一个重要课题。这是因为文化的全球化不能也不应该代替文化的民族性。通常情况下,就算文化差异在全球化进程中已逐渐被缩小和融合,也没有哪一个民族会毫无顾忌地放弃自己原有的本土文化和民族身份,去接受一种外来文化。但是在全球化的氛围里,人们又不得不和外来文化打交道。他们或许先是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自觉或不自觉地吸收了不同的文化元素,然后再对这些元素进行比较、鉴别和取舍,看看它们是否能够纠正或者填补原有文化的不足,是否可以融合到原有的传统文化当中,是否能够满足新文化语境的真实需要。于是,他们在



改变旧有生活方式的同时,渐渐地建立起一种新文化。一个人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运用是这样,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亦是如此。比较文化研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的。虽然有关文化的界定五花八门,千差万别,不一而论,但究其实质,不外乎是人类生活方式或者思想方式的反映和概括。所谓文化比较从本质上说也就是对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的一种对比和思考。文化对比虽然早就开始了,但是真正系统全面地进行考量的著作和理论似乎还不多见。实际上,文化比较也是一种文化批评。这里借用社科院外文所赵一凡先生的几句话来了解一下这个领域的大致情况:“至于文化批评新学风,是一种多功能综合批评方法。特征是以新进批评理论为先导,破除传统的人文中心论,超越学科分治界线,强调角度与方法的多样化,追求宽大复合的学术视野,以及广大积极的读者反应。”^①

从方法论而言,赵先生所勾勒的批评范围也是本书试图遵循的基本原则。虽然不再拘泥于传统的人文中心,但是一些人文学科和内容仍然是本书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此外,本书的学术批评和比较研究的视野还会进一步扩展到一些相关领域,例如,语言、绘画和科技,目的是拓宽我们的视野,增加文化批评和比较研究的实用价值,使得文化研究具有更为强烈的实际意义,真正体现其所涵盖的对人类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影响。

二、本书的要点

保留与推进本国文化的必要性在当今的世界受到了普遍的认同,实际上也一直在进行当中。这与一个国家民族性的建立、社会和思想体系的发展息息相关。传统文化无疑是民族性诸要素中的精华,也是最具吸引力的部分,这点大概毋庸置疑。与此同时,任何传统文化中的不足与劣根也在某种程度上延缓了社会与思想的发展。当人们自豪地回想起自己国家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时,有时也会为其曾经的落后与丑陋而嗟叹。

^① 赵一凡:《美国文化批评集》,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4页。



近代以来,西方的崛起和一些东方古国的衰落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世界范围内的现象。一些文明古国,诸如中国、埃及、印度,甚至伊拉克的经历都印证了这一点。从学者的眼光来看,文化比较研究不失为一种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纠偏防错,答疑解惑的手段;同时也有助于普通人拓宽视野,防备狭隘的民族主义,了解外面更多的社会文化思想,借助比较的手段来加深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

(一) 思想意识的主导地位

比较研究吸引人之处在于人们研究过程中所享有的学术自由和理论交叉带来的开阔境界。尽管文化比较的长处很多,可以让我们清晰地辨别、比较双方的优劣强弱,就某个特定的问题进行一些较为深入的探讨,我们还是要警惕比较过程当中容易产生的过泛、过多、过于任意和过于主观的问题。虽然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地放下一切政治、种族或者社会文化的偏见,集中于学术问题的探讨,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尽可能做到客观和公正,但是实际上客观公正都是相对的。只是比较本身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的方式可能有助于更为客观公正地呈现一些事实和观点。

作为一门交叉研究的独立学科和实用方法,我相信比较文化研究会更加有效地拓展人们的学术视野,提升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水平。我们应当明白知己知彼的重要性。一个人在不了解自己和对手的情况下贸然前行是危险的。这是历史的经验教训,也是我们在当下日益复杂的国际文化环境中做好文化研究的必要方法。

我一直认为,漫无目的的研究是徒劳的,文化比较研究应当要限定在一个与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紧密相关的范围里。鉴于文化研究容易产生大而无边,漫无边际的毛病,从而误入歧途,有必要确定我们讨论的大致范围。本书的文化比较研究主要囊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思想意识、文学艺术以及人文学科的其他一些领域。这其中,思想意识的作用在人类文明的任何阶段都是重中之重,其地位和影响尤为突出,在诸多领域当中担负着领导和先行的重任。

可以这么说,思想意识是人类文明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中西双方都有许多著名的思想家对此进行过探讨。其中较有说服



力的莫过于让-雅克·卢梭有关人类起源的著名论断。他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一文中指出,人类与动物最初的差别在于人类对同类的特殊同情心,此外并无多少不同。他认为,人类只有通过培育理性和语言能力,才能在保持同情心的同时了解自我的价值。于是一个共同体就自发产生了。他认为,这是人类几乎最完美的时刻。在《社会契约或政治权利的原则》中,卢梭还对立法者的实际作用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并引进了“公意”的概念,同时对处理特殊与一般、个体与公众、现实与道德之间的冲突提出了解决方法。卢梭的这些思想为日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①。离开了他的这些思想,人们很难想象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社会会变成什么模样。

思想意识也是中华文明发展的核心理念。撇开对儒家思想的好恶不谈,我们不得不承认它曾主宰了中国两千年左右的社会和思想发展。在中华文明潮起潮落的历史长河之中,虽然有过动荡和不安,儒家思想始终维系并发展了一个相对独立和稳定的社会形态。无论它对普通老百姓是好或坏,不可否认正是儒家思想催生、引领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灿烂文化与历史发展进程。

除了思想意识,尤其是主流思想意识在社会发展中占据的重要地位,我们还乐于展现这些思想在不同的条件下对于推动社会 and 心智发展所发挥的作用。在早期中西社会发展当中,思想意识的作用都得到了应有的展现。无论是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还是古希腊的伯里克利(或者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时期,思想意识的发展都呈现出一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朝气蓬勃的景象,各种思想流派的争相斗艳与多元发展不仅为制定不同的统治策略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也大大活跃了学术氛围,为普通人的心智发展创造了宽松的条件。这些思想元素在当时作为至关重要却独立自主的文化思想的一部分,融入由道德伦理、学术观念、社会发展准则和军事作战策略等构成的意识形态当中,初步确立了中国和西方意识形态的基本框架。即使不够完整成熟,这些准则也被当作一种指导思想而

^① 见 R. 奥迪:《剑桥哲学词典》,剑桥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 800 页。



运用到人们的日常行为之中,从而成为当时社会和思想意识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成员。其中一些准则被普遍接受,在一些国家成为法律,比如说,中国周朝后期的礼仪规范和古希腊苏格拉底前后的一些法律条文。似乎可以说,人类文明的早期阶段,思想意识的重要性已经逐步为人们所认识,但其发展却并不带有强制性,而是允许差异,生灭自取,顺其自然,各行其道。统治者对于不同的思想观念或许也有自己的好恶与取舍,但一般情况下不予干涉。当然这些思想流派在当时情况下虽然都很活跃,却都普遍地位卑微,且互相独立,并没有显示出其日后的威严。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思想意识的发展对意识形态的形成、心智发展和社会变动,乃至经济和文化的进步都表现出日益增长的影响。

一般而言,统治者个人,无论出身如何,通常都受过一定的教育,或者通过自学有一些文化,也逐渐感觉到了思想意识对他们执政的重要性。或许在统治策略当中考虑对思想意识的运用只是一种偶然,但更可能是少数政治家的一种深思熟虑。然而一旦运用起来,便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于是对思想意识或者意识形态的关注很快成为人类文明某些阶段的潮流。在中国,最早是西汉的董仲舒提议将儒家思想确立为中国唯一的正统思想。不约而同的是,三四百年后罗马帝国的康斯坦丁大帝也将基督教信仰合法化,随后他的继承者宣布基督教为国教和唯一正统思想。中西方这两个事件揭开了中西文明发展史上划时代的一页,从此一种特定的宗教或思想的地位超越了其他思想流派,在中西双方的心智版图上异军突起,盛气凌人,凭借拥有的特权在不长的时间里控制了中西双方的整个精神世界。此时的思想意识已经失去了先前的独立和自由,而不得不履行其承诺的对封建统治者和世俗社会的责任。

与此同时,其他流派的思想开始沦落为二三流之类的次等角色,不是被忽略和遗忘,就是在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或者基督教思想的强势下渐渐消逝。在以后的漫长岁月中,中西双方都经历了雷同的阴霾黑暗与萎靡不振。中古或中世纪的封建专制和思想压迫给中西双方都带去了上千年的社会动荡和经济的不确定与不景气,给普通人带去了无穷无尽的肉体和精神痛苦,给有文化的人带去了



严酷的思想禁锢。这种长期的折磨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早已司空见惯，他们不得不忍气吞声，沉默寡言。期间他们进行过许多次的反抗，但是结果不是遭遇残酷的镇压，就是成果遭人篡夺，或者换汤不换药，于事无补。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16世纪东罗马帝国的灭亡。西方人从此以后打开了通向现代社会的大门。而中国人不得不再忍耐三四百年，经历了更多的曲折和痛苦。中西双方，尤其是中国，在社会转型和建立新的社会制度上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值得注意的是，中西双方虽然在中古（中世纪）时期经历了许多朝代的更迭和毁灭，都没有撼动儒家思想和基督教思想的精神统治地位。统治阶级及其思想的长期霸道造成了权力滥用以及腐败、堕落、奢侈、贪婪等丑闻，引发了难以计数的战争和其他灾难。这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段时期。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明显地滞后。儒家思想和基督教思想对这段时期的大量灾难和苦难也难辞其咎，在很多情况下，这两种统治思想不是熟视无睹，就是起到了帮凶的作用。

中世纪末期的西方人在思想文化上感受到了空前的压抑，可是这种压抑又不好直接地表示出来，艺术家们于是开始从古典主义当中寻找灵感。西方的文艺复兴就这样启动了。这场延续了两百多年的运动其实并非什么正式的运动，既没有组织，也没有章程或者目标。严格地说，这是一种心灵的呼唤，一种真实情感的流露和一种人性的揭示。艺术之后，紧接着戏剧、诗歌、思想、宗教很快也加入到了这股要求思想解放，冲破神学禁锢，争取个人自由的潮流。在两个世纪的长河里，文艺复兴唤醒了千百万欧洲人的良知，改造了他们旧有的宗教信仰，清除了陈旧的传统理念，摒弃了阻碍他们前进的各种思想障碍，回归到人性的怀抱里。从文艺复兴当中集聚和获取的力量开启了西方人走向新世界的窗口。从此他们开始乘风破浪，披荆斩棘，勇往直前，走向世界，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迈入到一个崭新的新纪元。

文艺复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肯定了它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这种成就不仅反映在绘画、戏剧和诗歌这些传统的文艺领域，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打破宗教神学与封建专制的桎梏，复归人性上面。这一



思想理念在文艺复兴当中发展成为一种声势浩大的思想潮流,有力地推动了西方人心智的发展,并一直延续到启蒙运动,最终成为西方思想意识的核心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启蒙运动的兴起不是偶然的。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殖民主义的扩张,西方世界自文艺复兴起大大地提高了发展速度。这时候西方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思想意识的重要性。先是在英国,后来在法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为国家和民众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人们由此意识到经验主义的重要性,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知识的产生和资本主义的实践联系起来,启动了一轮轰轰烈烈的以宣扬自由、民主、平等和博爱为核心的启蒙运动。这个运动的先驱者是英国的洛克和霍布斯,主要代表人物则是法国的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他们的思想为当时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摇旗呐喊,通过社会契约理论描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勾勒和鼓吹了西方人应当遵循的自由民主理念,揭示和批判了封建专制和神学桎梏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灾难。他们的启蒙思想不久从法国传向欧洲其他国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市民百姓的认同,为资产阶级推翻封建专制,建立民主共和的国家体制提供了理论基础。

促成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卢梭、伏尔泰和孟德斯鸠这样一些思想家的远见卓识;另一个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遍运作。从16世纪,甚至更早的时期开始,欧洲人已经逐步摆脱封建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转而进入资本主义的以契约和雇佣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生产和生活方式。这种方式的转变自然引发了人们对人身自由的向往和对剥夺人身自由的封建专制的厌恶。于是投身于追求自由和反抗专制的资产阶级革命也就顺理成章了。

如此说来,一旦思想意识符合社会需求和大部分人的愿望,这种思想就会受到欢迎,所向披靡。思想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资产阶级掌权之后,对此大概深有体会,对于思想自由常常比较尊重。无论何种思想意识出现,只要不是在行动上威胁到社会安全,一般都不予禁止。宽容和批判精神作为处理不同意见的两种方式,能够让各种不同思想流派得以互不敌视,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竞相



发展。

相比之下,中国从封建专制到民主政治的转变则稍迟了一步。直到20世纪初,中国才最终摆脱了封建专制王朝,比西方晚了二百年左右。这一现象有其政治和文化传统的深层原因。政治方面,中国向来强调中央集权和一统天下。历朝历代,都只能允许一个统治者和一种正统思想。在西方,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只是特殊情况。从古希腊开始,西方历史大部分时候是以分治为标记的,当然其间不乏短暂的统一时期。诸如罗马帝国时期和查理曼大帝的神圣罗马帝国时期。长时间的分治局面使不同的政治实体得到生存的机会,也造就了不同民族文化的繁荣景象。文化方面,自古以来在中国,无论是在一个家庭里,还是在一个政府中,民主都不是讨论问题、形成决议的基础。人际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由年龄、性别、阶级、地位、职业和血缘这些因素构建的等级制度。这自然与西方处事方式大相径庭。从古希腊城邦开始,从家庭事务的处理到贸易往来,乃至政府的日常工作,西方民主就成为听取意见,做出决定的基础。这种行事方式影响到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处理各种事务的方法。即使这一原则曾在中世纪受到过不少干扰,但它在西方社会发展和文化传承过程中一直延续下来。

中西思想差异的另一原因在于对待不同或相反意见的态度。通常,中西双方统治者都会通过强制手段执行他们的统治思想。为保住他们的统治地位而造成了无数的战争、杀戮、迫害和镇压。但这一趋势在西方的文艺复兴之后得到了明显的改善,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印证了这一点。当时,英国权力的交接没有通过流血的暴力手段,而是通过协商的妥协来完成。这在英国当时政治,甚至在西方政治历史上都是不多见的。这证明了人们可以通过非暴力手段来实现政治目的或减少政治分歧。随后,在其他西方国家,妥协与和解的手段被广泛应用,成为解决各种问题和避免暴力的一种原则与方法。在丹麦、瑞典、卢森堡和比利时,甚至日本这样一些国家,君主立宪政体的建立正是君主与资产阶级之间妥协的结果。

相比之下,古代中国的统治者在对待不同思想时显得更加冷酷和缺乏宽容度。中国历史上不计其数的内乱都证明了这一点。西



方历史上也曾有过相同的事件,这些都说明了在历史的过渡和不稳定时期,暴力不可避免。然而在西方开始转向摒弃暴力思想的时候,古代中国仍然将暴力手段作为处理政治或是思想分歧的主要手段。而且,古代中国的暴力手段非但不限于诸如领土扩张,平息少数民族叛乱这样一些政治领域,还延伸到处理不同见解的文化思想领域。统治者对思想分歧采用了血腥的镇压手段。例如,清朝康熙、乾隆时期的一系列类似文字狱的迫害,对偶尔有些牢骚手无寸铁的读书人大开杀戒。算起来,这段时间,也就是18世纪前后,应当非常接近西方的启蒙时期。然而不幸的是这样不光彩的传统依然延续了下去,甚至到了封建社会瓦解以后的20世纪,中国依然内战连连,思想异见引发的麻烦仍不少见。许多人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遭受了许多苦难。尤其是一些勇于表达自己不同政见的年轻学者,更是屡遭厄运。有的时候人们怀疑这些苦难的经历是否是中国文化的典型特点,是否与统治阶级缺乏容忍异己的态度有关。在西方,暴力同样是处理思想分歧的一种手段,例如,中世纪基督教宗教审判所对于异教徒的审判与迫害同样也是非常残忍的。但总体上说,西方似乎对于不同思想观念的处理要宽容一些。

第三个原因或许在于理性思考的传统,它曾是西方古典主义的核心,为推动后来的心智和思想发展作过贡献。譬如说,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都受到了理性主义的影响,它是批判基督神秘论和坚持人文主义与科学研究的指导思想。相比而言,古代中国思想在科学和理性传统方面有所欠缺,宋代和明代曾有理性主义倾向的思想流派成为统治阶级思想,但这种理性基本上只是对儒学思想的一种阐释,和崇尚知识与科学的西方理性还有一定差别^①。古代中国思想更多地充斥着专制、盲目信仰和迷信,它们在历史上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阻碍了一度很强大的中华文明的进一步发展。

缺乏批判精神和过度强调思想统一是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特点。这种特点显然助长了对待不同思想的简单和粗暴态度,也不利

^① 宋朝理学的代表人物是朱熹,他主张宇宙的根本在于“理”和“气”。这一思想成为解释封建王朝专制统治,实施封建道德统治,以巩固中央集权和千秋万代的理论基础。



于克服滥用职权引起的腐化堕落和贪污奢侈等一系列弊病。问题不是一天产生的,解决当然也不可能一天就能完成。或许更为重要的还是从源头上找出解决的办法。

(二)文化传统和文学艺术

文化传统一般是指大范围的文化思想领域,其涵盖面可以包括文史哲,或者人文学科诸领域,文学与艺术理所当然属于这一范畴。既然是传统,少不得要涉及从前辈人乃至祖先那里传承下来的各种思想观念、方式方法、形式特征、内涵外延。

中西双方的文学自古以来源远流长。它们在起源、功能、主题、风格及技巧等方面既有大量相似之处,又有诸多不同,多半反映在诗歌和小说这两种最有代表性的文学体裁里。

文学和艺术作品是在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为了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而产生的。一般来说,这些作品都具有娱乐和教育的双重功能,在愉悦和放松精神的同时培育人们的道德情操。现代主义出现之前,这两种功能一直作为一种神圣的目的在文学和艺术领域里运作,受人推崇,稍有违反便要受到提醒,轻则自责,重则接受批判。后来一些现代主义的激进派,如达达主义和未来主义试图否定这些传统思想和形式,但最终传统文化依然如故,它们却早就销声匿迹,不见踪影了。可见传统文化历经考验,自有其存在的价值。文学和艺术所具备的娱乐和教育的双重特性因中西文化或个别作品的差异而不尽相同,但其多样性的表现离不开娱乐和教育的双重功能,这方面应当允许求大同,存小异。

早期文学和艺术的产生是出于人类记录历史和表达情感的需要,正如中国一句古话所说的那样:“诗言志”。作者能否酣畅淋漓地表达人的思想,我们又以什么样的标准加以评判,会是一部文学艺术作品好坏的关键。我们从诗歌和小说中接受的道德和价值观念也会随着社会和思想的发展而改变。然而,有一些价值观念是根深蒂固的,比如,爱与恨、善与恶、穷与富、美与丑。作为共同点,中西文化或文学的批评都很看重这些原则对于衡量文学作品好坏的价值。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思想交流大大缩小了中西双方之间的



差距,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仍然有些差异影响到我们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但是我们要强调鉴于中西方之间的巨大差异,有些分歧是正常的,它们不应该成为我们之间进行交流的文化障碍。文学作品如诗歌和小说中所体现的文化差异正好可以成为我们沟通交流、互相理解的绝好机会,我们需要通过这些交流来搭建一座沟通文化的桥梁,最终实现文化的共存共荣、相互理解的愿望。

比起小说和其他文学形式,诗歌更注重形式和情感的表达,比如,韵律、比喻、结构和寓意。中国著名的唐诗宋词便对韵律有着极高的要求。诗歌创作的不易限制了诗人和作品的数量,并将许多普通百姓挡在了这一文学形式的门槛之外。纵然西方的诗歌在韵律方面的要求没有中国古代诗歌那么严格,在文艺复兴以前,西方诗歌的读者圈子也很有限,只有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贵族和学者们才能通过诗歌而不是散文的方式来表达情感。

中国汉字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多声调。中国诗人在选词造句方面需要仔细斟酌,反复推敲,通过巧妙的安排与应对来展示诗人的才华。复杂的诗歌技巧适用于较短的抒情诗,而在较长的叙事诗里常常有些力不从心。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漫长的诗歌历史上,鲜有长篇叙事诗或史诗的缘故。相比之下,西方诗歌在韵律上显得较为灵活,没有那么多的清规戒律,比起要求词与词之间,甚至字与字之间绝对对称的中国古诗来要简单得多。难怪《荷马史诗》及后来的一些史诗能够接二连三地推出,并一度盛行于西方诗坛和社会了。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中西文化差异的另一重要方面。一方面,诗人和作家都有意或无意地在他们的作品中流露出某种政治倾向,表达出他们对某一社会事件的赞同或反对、喜欢或讨厌,这与他们个人的性格和所要表达的主题有关。另一方面,他们在进行文学艺术创作的时候,很难不受到当时政治情势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或者他们本身就是做官的或者事件的参与者。总而言之,人们总是生活在某一社会领域中,不可能摆脱政治所带来的影响。

中国文学更是如此,它向来强调写作服务于社会的目的。唐代著名的诗人和批评家白居易最先提出这一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



歌诗合为事而作。”^①古代中国的诗人和艺术家数量不多，他们中的多数不是官员就是学者，用不着为日常生活开支而担心。在古代中国，大多数学者总是愿意踏入仕途以求衣食无忧，这些人后来几乎都成为孔孟思想的继承者和宣传者。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不知有多少知识分子为博取功名而呕心沥血，肝脑涂地。因此，政治理想和抱负在他们的文章和作品中反复出现也就不足为怪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许多文人墨客追求的境界，也足以反映中国知识分子的可贵之处。他们的不足之处在于，由于过分追求政治抱负而失去了更为重要的独立人格。

西方学者似乎对于政治抱负并不十分感兴趣。这是因为从职业考虑，当官比起从事神职或经商来，并不具有多少吸引力。很多西方作家，尤其是神职人员或贵族身份的人，由于没什么政治抱负，反而在创作思想和语言表达方面有更多的选择自由。

文化比较还可能涉及审查制度方面的问题。理论上讲，除了儒家思想的精神束缚，中国文学并没有什么审查制度。然而实际上，人们在创作过程中有一张无形的网不可逾越，那便是不能触犯皇帝和达官贵人的威严和利益。当然也有一些大胆的作家和艺术家无视封建礼教，在创作中直陈他们的不满，对抗朝廷和统治者。中国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譬如，屈原、杜甫、李白、白居易、辛弃疾等人或流派在他们的作品当中都有过程度不同的牢骚怪话。不少书因为犯上而被禁。基本上中国历朝历代都明令禁止有悖当朝令旨的任何书刊的发行。

西方文化传统更加注重道德准则的约束作用，而对政治言论比较宽容。然而在黑暗的中世纪，不同政见也会引火烧身，但丁的《神曲》便为他招来过麻烦。资产阶级掌权后，有许多具有政治异议的诗歌、小说还有艺术作品虽然也许会遭到排斥，却没有被查禁。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和雪莱在他们激情澎湃的诗歌中反复表达过推翻统治阶级的强烈愿望。小说家如狄更斯、威廉·萨克雷、司汤达还有维克多·雨果也曾在作品中表达了对贫苦大众的深刻同情

^①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会编：《中国文学史Ⅱ》，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449页。